

1949 年前来华留学发展史钩沉

——基于史、志、传的资料

王昕生

提 要：“留学”一词借用于日语，最初是指倾慕中国文化的日本青年跟随遣唐使来华求学。来华留学古已有之，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的来华留学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本文通过历代史、志、传中的资料，梳理来华留学的发展历史，将 1949 年以前来华留学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的“儒学时代”，与亚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传教士汉学时代”和各国学生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专业汉学时代”，并探究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的流动、认同和融入的特征。

关键词：来华留学史 留学生 汉学

留学生通常指在母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来华留学古已有之，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的来华留学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中文语境中的留学生一词源自日语りゅうがくせい (ryūgakusei)，原指跟随遣唐使者来华求学的日本青年。隋唐时代，日本在派遣使节访问中国时，同时派出了“留学生”和“还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文化。“还学生”在遣唐使完成外交使命后随其一起回国，“留学生”则在遣唐使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学习^①。《旧唐书》沿用了这一特殊称谓，其中记载“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②。随着时代的发展，“留学生”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从特指“日本来华求学的学生”到泛指“离开长居之地赴外求学的人”^③。从专指“来华求学的外籍学生 (foreign student)”，到涵盖“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④。

“一部留学史蕴藏着有关对自我与他者认知、文化冲突与融合等等无尽命题，是对文化冲突、适应、吸收、涵化、嬗变及传播的研究”^⑤，对来华留学史的研究“不仅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的背景、动机、途径，他们在华学习、生活、活动的实况，对中国的认识、态度、心态，及其在中外关系上的表现和中外文教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涉及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曲折历程、机制、规定”^⑥。本文通过历代史、志、传资料，梳理来华留学的发展历史，将 1949 年前的来华留学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的“儒学时代”，与亚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传教士汉学时代”和各国学生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专业汉学时代”，并探究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流动、认同和融入的特征。

① 之士：《“留学生”一词源自中国唐代》，《政府法制》2010 年第 18 期。

② 《旧唐书》卷 199《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75 年标点本，第 5341 页。

③ 傅鸿础：《谈“留学生”一词的词源及词义演变》，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 年。

④ 刘集林：《从“出洋”、“游学”到“留学”——晚清“留学”词源考》，《广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⑤ 李雪涛：《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留学史》，《教师博览》（文摘版）2016 年第 11 期。

⑥ 王晓秋：《十年心血铸一剑——评周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神州学人》2018 年第 6 期。

一 万国衣冠拜冕旒：唐宋时代的留学生

隋朝建立初期，崇尚佛法和中国文化的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推行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除以朝贡为名多次向中国派出外交官员（遣隋使）进行外交和贸易谈判外，同时派遣大批学问僧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佛法和中国文化。有关文献记载，日本在公元600—614年间共派出5批遣唐使节^①。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使团访华，《隋书》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②。《日本书纪》详细记录了日本推古十五年（607）小野妹子来华时随访学生的情况，包括留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和学问僧：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③。留学生是来华学习隋朝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学者，学问僧则主要研修佛学，同时涉猎文学和哲学。这两类人群大多由“新汉人”或“汉人”——即汉人移民或移民的后裔组成，他们精通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可以快速适应中国的学习环境。同时，他们的在华学习时间普遍较长，607年来华留学的那批学生和僧侣中，倭汉直福因、新汉人广齐在华16年，新汉人旻25年，志贺汉人惠隐、高向汉人玄理、南渊汉人请安留学时间超过30年，他们见证了隋唐的更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日本政坛，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做出巨大贡献^④。

“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⑤唐朝来华留学规模更大、辐射更广、相关制度也更趋成熟。日本是官方派遣留学生较多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学者考证，唐代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实际成行15次），每次随行的留学人员约10—20人，留名于史册的共计150人左右，包括学者身份的留学生和僧侣身份的学问僧^⑥，学问僧的人数是学者的三倍半以上^⑦。新罗是唐代另一大留学生主要派遣国，留学生规模甚至超过日本。据严耕望统计，新罗学问僧有据可考者达130人，实际人数或远超出此。而留学生人数“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⑧，因人数众多，国子监为其专设“新罗马道”；此外，南诏、真腊、尼婆罗、高昌、吐蕃等国家均有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记录，《唐会要》载：“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⑨《新唐书》亦载：“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⑩隋唐之后的两宋时期，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热情大为下降。日本因长期内乱，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再以政府名义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高丽则由于“受制于辽朝，朝贡中绝”，史书所载的宋代高丽官派留学生仅11人^⑪。两宋时期留学僧的数量也有所下降。

① 王心喜：《日本“遣隋使”来华目的及年次探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隋书》卷81《倭国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226页。

③ 参见〔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51页。

④ 参见李金明：《隋唐时期的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

⑤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⑥ 参见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⑦ 参见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5年，第121页。

⑧ 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425—481页。

⑨ 《唐会要》卷35《学校》，中华书局，1955年，第633页。

⑩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763页。

⑪ 参见伊森：《古代的外国留学生们》，《视野》2019年第21期。

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来华学习目的和求学路径也各不相同。留学生多出身于贵族阶层或中产家庭，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异国留学的能力，并甘愿承担远渡重洋的风险，他们来华后首先要通过官方组织的难如“登仙籍”的“宾贡科进士”考试^①。通过考试的留学生被安排在固定场所（国子监六学）学习和居住^②，由专业的教师（博士或助教）培养，享受国家提供的奖学金（俸禄），并接受统一的机构（国子监）管理，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是儒学经典的治国安邦之道^③，学成后可以选择参加唐朝的官员选拔考试，也可选择回国投身仕途，入仕唐王朝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和学成回国的日本政治家吉备真备都是其中佼佼者，但无论留在中国还是回归母国都需要经过官方的批准^④。学问僧是在佛学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或有志于学习、弘扬中国佛法的各国僧侣，他们来华主要专注于学习佛法，同时致力于促成中国高僧赴日本讲学，其中最富盛名的事件是鉴真东渡。两国僧侣的跨国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双向交流。学问僧的求学模式近似于“游学”，虽有统一管理机构（鸿胪寺）和国家提供的资助，但他们居无定处，学无定所，往返于中国的名山大川，求道于高僧大德，学习和生活模式更为灵活自由；大部分留学生及学问僧是通过国家派遣渠道来华学习，也有少数通过自发的、民间的途径来华学习，如因从事国际贸易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侨胞，《资治通鉴》记载“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服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⑤，他们同样有机会在华接受教育、参加科举甚至入朝做官。唐宋时期广州、泉州等地还专门为这类群体设立“蕃学”。《中吴纪闻》中记载宋朝时的广州“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⑥。宋代官方交流停滞，学问僧多通过民间渠道自费来华，他们求学的目的并非代表国家取经求法，而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来华朝拜胜迹，消除业障^⑦。

国力盛衰是影响官派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的主要因素，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力达到鼎盛，来华留学生规模亦达到顶峰。《旧唐书》记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篋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⑧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各国与大唐合作的意愿减弱，留学生规模急转而下，《唐会要》记载元和二年（807）“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⑨。经济兴衰主要影响民间交流的留学生，“蕃学”之所以设立在广州、泉州，恰恰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是国际贸易重镇；文化强弱主要影响民间交流的学问僧，唐武宗实施的灭佛运动导致了佛教的衰落，中学西传则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壮大，此消彼长之下，两国对佛法的研究水平已经存在一定差距，这也导致外国僧人入宋大多以到佛教圣地出家巡礼或求得明悟为目的，来华“求法”的学问僧规模有所下降^⑩。

① 参见杨希义：《唐代宾贡进士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1993年。

② 参见张伯伟：《“宾贡”小考》，《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参见赵蓉：《唐代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及原因》，《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

④ 参见郭丽：《唐代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⑤ 《资治通鉴》卷232《唐纪四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7493页。

⑥ 龚明之：《中吴纪闻》，中华书局，1985年，第32页。

⑦ 参见高留成：《唐宋时期日本来华留学僧之比较》，《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⑧ 《旧唐书》卷189《儒学列传上》，第4941页。

⑨ 《唐会要》卷66《国子监》，第1160页。

⑩ 参见〔日〕半田晴久：《日本入宋僧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0页。

这一时期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华交流时间长、认同程度高、融入程度深。木宫泰彦在其著作中提到日本留学生在遣唐使回国后通常在华继续居住10年至30年,这一期间他们遵从唐朝的风俗文化,衣食住行与唐人无异,改从唐人姓名、交往唐人朋友,甚至与唐人结为夫妻的情况均屡见不鲜^①。留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参与程度同样较高,阿倍仲麻吕在华官至左拾遗,并与诗人李白、王维交往密切,诗作唱和。新罗人崔致远进士及第后在朝为官多年,其著作《桂苑笔耕集》是“少有的、保存至今的外域人记述一些唐朝史事的文集”^②。学问僧空海来华留学不仅学得佛法经典,回国创立日本密宗,同时也精研中国书法,成为日本“平安三笔”之一。大食人(阿拉伯人)李彦升及第的故事成为陈黯《华心》的原型^③。

唐宋时代来华留学生在回国后对本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派遣来华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如日本、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等国,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积极学习,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逐渐形成。其中,日本对唐文化借鉴最多、吸收最彻底。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化改新”就是在来华留学生高向玄礼、僧旻等人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对唐朝国家体制的全面模仿^④。留学生也将唐朝文化器物和生活方式引进本国,新罗留学生薛聪回国以后,利用汉字创造了新罗文字,史称“吏读”;日本留学生空海回国后,仿汉字草书创立日本平假名^⑤;中国的茶道、围棋、书法也纷纷成为周边各国一时的潮流风尚。总而言之,唐宋时期来华留学生促进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和普及,自此以后,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元朝时期,儒家文化已经深入亚洲一些国家的平民家庭中。在真腊(今柬埔寨),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作“班洁”^⑥。

二 中学西传与西风东渐:明清时代的留学生

明清时期来华留学生仍以亚洲国家官派为主,整体规模不及唐宋时期,明代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琉球(今属日本)、暹罗(今泰国)、高丽(今朝鲜)、占城等国,其中琉球派遣的学生最多,《明史》中共有11次派遣记录,人数共35人,日本、高丽、暹罗仅一次^⑦。清代不仅有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俄国也陆续派出留学生,《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⑧,在与清朝政府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后,俄罗斯来华留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从1727年到1840年间,俄国共派遣40名留学生来华留学^⑨。外国留学僧来华交流史不绝书,直至清末国力衰弱、佛教式微才中断^⑩。明清留学僧多来自日本,主要通过民间渠道来华访学,也有少数经由官方派遣^⑪。官派留学生以王亲、大臣子弟居多,他们代表国家

① 参见[日]木宫泰彦,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8页。

② 参见田廷柱:《论〈桂苑笔耕集〉的史料价值——兼评高骈其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③ 参见《全唐文》卷767《华心》,中华书局,1983年,第7986页。

④ 参见赵蓉:《唐代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及原因》,《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

⑤ 参见高文汉、李秀英:《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年第2期。

⑥ 参见黄明光:《明代亚洲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举考试状况探议》,《学术研究》1996年第1期。

⑦ 参见黄明光:《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⑧ 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⑨ 参见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⑩ 参见楼宇烈:《中日近现代佛教的交流和比较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⑪ 参见陈小法:《洪武七年的日本入明僧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

来华访学具有一定外交性质。留学僧多因个人动机访华，或为“钻研禅法”，或为“求取碑铭”，或为“学习诗文”^①。

明清时期官派留学生的培养和管理已较为成熟，学生来华先在礼部报到，后前往国子监，根据汉语水平和感兴趣的学习方向进行培养^②。所有的官派留学生均享受国家资助，待遇甚至高于唐宋。《明史》记载：“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赐巾服靴绦、衾褥帷帐，已复频有所赐。一日，帝与群臣语及之。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庠序，新罗、百济并遣子来学。尔时仅给廪饩，未若今日赐予之周也。’帝曰：‘蛮夷子弟慕义而来，必衣食常充，然后向学。此我太祖美意，朕安得违之。’”^③唐代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在中国各地游历或继续从事研究，在华时间可达10至30年。明清时期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的时间和活动管理则非常严格，大部分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即被要求返回母国^④，也有少数留学生参加明朝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可授予官职。《南雍志》记载：“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⑤明景泰五年（1454）越南人阮勤考取进士，“勤举景泰五年进士。历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赐诰旌异。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筑墩台十四所，治垣堑三十余里。岁饥，奏免七府租四十余万石。入为侍郎，调南京刑部。蛮邦人著声中国者，勤为最”^⑥。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废除，但清廷依然为留学生组建专门机构以便选拔入仕，考取进士的外国留学生授翰林院修撰，时称“洋翰林”。亚洲地区官派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认可度较高，《明太祖宝训》记载“高丽国王王颙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⑦。相较而言，俄国的官派留学生适应情况较差，他们并不在国子监完成学业，而是居住在俄罗斯馆，由国子监的老师驻馆教学，因此他们深入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相对较低。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⑧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发现了到达中国的两条航路。明清期间，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思想，但却意外促成了研究中国、沟通中西的历史使命，成了特殊的“留学生”群体。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欧两地进行文化传播，一方面他们学习中文并在中国传播西学，促进了“西学东渐”；另一方面他们学习各种中国的专业知识，并用母语在西方传播，完成了“中学西传”^⑨。他们的作品形成了

① 参见韦立新、任萍：《日本初期入明僧的目的考辨——以绝海中津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参见黄明光：《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明史》卷323《外国列传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363页。

④ 谢必震：《明清时期中国培养琉球留学生述略》，《教育评论》1992年第2期。

⑤ 黄佐：《南雍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9册，第374页。

⑥ 《明史》卷178《阮勤列传》，第4739—4740页。

⑦ 《明实录》卷6《明太祖宝训》，中华书局，2016年，第486页。

⑧ 任继愈：《建构文化交流的桥梁——“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总序》，任继愈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⑨ 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第3页。

“汉学”和“中国学”的雏形^①，也让欧洲大陆学术界将研究眼光投向中国，为此后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以“研究中国为志业”的西方学生来华留学埋下伏笔，西方留学生的到来也将促使“传教士汉学研究”向“学术汉学研究”转型。

三 想象的共同体：民国时期的留学生

晚清的来华留学仍然承袭隋唐以来传统模式，以官派留学生为主，生源来自朝鲜、日本、琉球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自费留学已有出现，如《湖北省志》中记载了朝鲜学生、学者赴叠山书院求学的经历，“朝鲜左海（道）成均世儒徐相默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携弟子边尚玉谒见万清轩，并住书院受教30余日”^②。

及至民国，周边国家仍有官派学生来华留学。王晓秋通过考察《北京大学校史》，发现民初时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曾有接收俄国和日本留学生的记录^③。这一时期，大批中国学生通过官派途径赴西方留学，中国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加之，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逐渐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往，主动邀请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数国增至二十余国，除了亚洲地区外，欧洲、美洲乃至大洋洲，都有国家开启派出学子来华留学的航道。”^④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生数量虽不及隋唐时期，但却真正意义上促成了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界的全面接触。一方面，1844年以后，传教士在华兴办了大批教会学校和新式学校，聘请了大批西方学者来华任教，为中外交流提供土壤，这些学校也成为民国时期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的首选^⑤；另一方面，最早的一批纯粹以汉学研究为目的的青年学生来到中国留学，他们弥补了传教士没有在中国经过系统学习和本土汉学家没有亲临中国进行考察的遗憾。与此同时，众多留学海外的中国青年学成回国，他们与初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彼此之间互动频繁、交往不断^⑥。

20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留学生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艾锷风（Gustav Ecke）、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等^⑦，法国留学生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⑧，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⑨，美国留学生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饶大卫（David N. Rowe）、柯睿哲（Edward A. Kracke）等陆续来到北京^⑩。这一时期的北京是风光无限的汉学中心。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在中国不同的教育机构学习研究的外国留学生齐聚于此，躬逢其盛。他们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共同的目标和志趣却使他们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如安德森在同名著作中描述的那位年轻棕色皮肤的英国人一样，在中国相遇的外国留学生“在每一次受到紧缩控制

① 吴义雄：《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 《湖北省志·教育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③ 王晓秋：《十年心血铸一剑——评周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神州学人》2018年第6期。

④ 余子侠、王海凤：《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演变历程及特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

⑥ 参见李雪涛：《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⑦ 参见李雪涛：《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⑧ 参见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15—224页。

⑨ 参见〔日〕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⑩ 参见顾钧：《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的旅途中，他都会发现一群能操双语的旅伴，而到头来他会逐渐对这些旅伴产生一种共同感。在他的旅途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他的出生之处——不管是族群的、语言的或者地理的——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出生至多只决定他会从此一朝圣之旅，而非彼一朝圣之旅出发而已”^①。这些留学生日后也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汉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本节以美国留学生费正清、德国留学生傅吾康、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三个典型个案，探究他们来华留学动机、留学期间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和认知，以及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状态。

1929年，22岁的费正清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学业，开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他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位《近代中国海关问题》的那天开始，他就与中国结下长久的缘分。为了获得一手资料，费正清于1932年前往北京，在中国华文学校开始了留学生涯。他来华留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学位，而是进修汉语，并为博士学位论文搜集材料。但出乎意料的是，费正清在北京期间不仅遇到多位中国的良师益友，还最终收获爱情。在他的回忆中，历史学家蒋廷黻待他如师如父，不但在学业上给予他关照，指导他查找文献，撰写论文，同时也为他在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当得知费正清留学奖学金申请失败时，蒋先生果断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渡过经济危机。梁思成是费正清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他的中文名“费正清”正是出自梁思成之手，费、正、清分别对应他英文名字中的Fair、John、King的发音，语含双关、意味深长，可以解为“费姓正直而清廉的人”。通过梁思成夫妇，费正清结识了一批从英美留学回国的精英，包括胡适、金岳霖、傅斯年、陈岱孙、周培源等。在北京期间他也与不少同胞相逢，与福开森、西克曼、毕乃德、卜德、顾立雅等学生有过交往。^②

傅吾康出生于1912年，是著名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因为父亲的原因他很小就接触了中国文化，并在双重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傅吾康在中学毕业后就把从事汉学研究作为终身的事业。1937年，刚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改革尝试》的傅吾康独自来到中国，在中德学会进一步学习深造。1941年结识了曾留学德国的胡隽吟并迅速坠入爱河，为了早日结婚，他提前结束了中德学会的研究工作，在师长萧公权的推荐下先后任教于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他对中国的印象始终是正面的：“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③并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了解西方，“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我在这里的环境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拥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能力。我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性的生活中去了”^④。在华期间他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买了四合院，娶了中国妻子，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还收藏了不少中国古书、名画。他在回忆中对妻子在他留学期间给予他的帮助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吾康初到中国时，人生地疏，得其引导协助，了解环境，克服困难，建立信心。其后数十年，辗转各地，更无时不赖其助”^⑤。

①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② 参见顾钧：《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第30—56页。

③ 李雪涛：《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第141页。

④ [德]傅吾康，欧阳颺译：《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39页。

⑤ 李雪涛：《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中文版序》，[德]傅吾康，欧阳颺译：《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10页。

吉川幸次郎 1904 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神户是中国华侨聚集的城市，这使他有机会在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环境中成长。高中时代他酷爱中国文学，1922 年即将高中毕业进入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利用假期时间赴华旅游，短短 20 天，他就被中国江南的美景深深吸引，“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①。京都大学的培养让他逐渐从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变成将研究中国文学当志愿，为了避免受到“与日本文化完全相同的国家”认知偏误影响^②，他认为应该到中国留学去“了解中国的一切”^③。1928 年至 1931 年吉川开启了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这段往事的回忆汇集在《我的留学记》。“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是大正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好的时期。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④与大多数民国留学生相同，吉川在北京大学并非正式攻读学位，而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在学习方面他“并没有仔细地读书，也没有在学习上十分用心”，但为了实现深入了解中国，他“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一切尽量中国化地穿行在北京古城的街巷中……不仅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在思想情感、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⑤，以“被当作中国人”为荣^⑥。留学期间，吉川住在日本留学生的专设宿舍“延英舍”，与日本同学切磋心得、交流学业，同时他非常注重利用留学的机会拜访中国名师大家，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与黄侃结识请教的细节。总体来说，幼年的生活环境、大学的专业选择、美好的中国印象促使吉川来华留学，并将从事中国研究作为终身追求。在北京三年的留学时光中，吉川尽可能通过揣摩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融入中国社会，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思考，避免“两国民族在观察对方时，都受到各自民族特性的影响”^⑦。

通过有限的历史材料，我们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们分别来自美国（美洲）、德国（欧洲）和日本（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代留学生的普遍特征：一是虽然大部分留学生仍然通过官方途径来华，但留学动机多与个人的需求和意愿相关，而不再是代表国家；二是中国的教育系统虽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大部分留学生也进入正式的教育机构学习，但他们留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学位，而仅仅是为提高语言水平和了解中国风俗，或为取得本国学位和教职收集研究资料；三是即便留学生对中国持正面印象，但也普遍对留学中国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前途并不看好。吉川幸次郎认为“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被压迫民族”^⑧。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及在华留学期间对前途渺茫的担忧^⑨；四是来华留学并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知识，而是“抱着把中国人做不到的东西来替中国人研究的态度”进行研究^⑩，这一“喧宾夺主”的“逆文化融入”现象也可以在中国学者的

①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33 页。

② 参见胡天舒：《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认知——以〈我的留学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2 期。

③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4 页。

④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12 页。

⑤ 钱婉约：《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情结》，《古典文学知识》2011 年第 4 期。

⑥ 参见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73 页。

⑦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173 页。

⑧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31 页。

⑨ 参见 Paul. A. Cohen & Merle Goldman, eds., *Fairban Remerber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

⑩ 参见 [日] 吉川幸次郎，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第 82 页。

记述中得到佐证，著名史学家陈垣就曾说道：“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上他们。”^① 在 1923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悬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②

总结与讨论

留学的产生离不开空间的变化和社会的流动，社会的巨变和繁荣都会加速流动。最早的留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子周游列国，广收门徒。外国僧人入华始于东汉，例如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僧人支谶、支曜，康居国僧人康孟详、康巨，来华主要目的是传法和译经^③。通过官方途径的来华留学始于隋，兴盛于唐，转衰于宋。至元代，由于战乱及蒙古贵族的统治政策，留学一事稀见于史。明代外国官生复至，是继隋唐之后又一次来华留学高潮^④。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外学术交流进入“西学东渐”的时代，西学兴起、中学衰落，来华留学的市场也每况愈下，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来华留学历史也进入发展的新篇章。

本文将 1949 年前来华留学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的“儒学时代”（唐宋时期），与亚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传教士汉学时代”（明清时期）和各国学生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汉学研究时代”（民国时期）。隋唐两宋时期来华留学的主要群体是周边国家达官显贵的子弟（留学生）和僧侣群体（学问僧）。明清时期上述群体的留学生规模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传教士自西而来，他们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自发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随着他们的研究在欧美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以研究为目的的西方学生和学者踏上了来华学习研究的旅程，他们逐渐取代传教士，形成了以研究汉学和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共同体。

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的来华动机、对待中国社会的态度、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模式各不相同，三个时代推动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主要动机分别为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多元因素；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对待彼此的态度可以依次总结为：从被“文化认同中心”边缘化，到双方彼此互相认同，到“多视角不排斥政治”，最后成为“非政治、非文化、非社会的行动主体”^⑤。留学生融入类型可以大致划分为：同化型融入（隋唐两宋）、边缘化型融入（明清时期）和多元型融入（民国时期）。

（作者单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页。

② 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编：《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③ 参见刘长庆、王桂琴：《论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从东汉到西晋》，《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④ 参见黄明光：《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⑤ [法] 米歇尔·维沃尔卡，王鲲鹏译：《社会学前沿九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